

台湾十大政治案件

主编：李义虎
副主编：陈福敏



台湾十大政治案件

主 编 李义虎

副主编 陈福敏 许晓闽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1号

台湾十大政治案件

责任编辑：安春杰

封面设计：杨建赤

台湾十大政治案件

主编 李义虎 副主编 陈福敏 许晓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1号)

双鸭山市印刷厂制版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74/16

字数：145,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207-02446-0/D·364 定价：4.30元

序 言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赵宝煦

近几年来，海峡两岸关系有了较快发展。台湾人民和学者，包括不少社会知名人士，来大陆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者日渐增多。同时，两岸间经济商业往来、文化体育交流以及各种学术活动也都有了可观的进展。虽然目前双方还未能做到有来有往，对等交流，但这种频繁接触，已经对两岸人民的彼此了解，互相认同，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有利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种形势下，大陆学者对于台湾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尽管在研究机构少，专职研究人员更少的情况下，许多很好的和比较好的有关台湾问题的著作和出版物仍陆续问世。有的探索历史，有的史论结合，有的在掌握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动态。许多成果表明，我们的研究工作在台湾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各专门领域中正分别向深层次拓展。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些努力，不仅为我们的台湾问题研究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同

时，也大大有助于党和政府对台政策的科学决策过程。这都是值得称道的。如果说，当前的台湾研究工作尚有不足之处，恐怕就是在实证研究、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方面，做得较少。当前，在前一段研究工作已经取得相当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从小题目扎扎实实做起，使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似乎是今后进一步发展台湾研究工作首先应考虑的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两年来组织了北京大学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研究人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就台湾政治发展情况，进行了几次研究讨论，并逐渐把焦点集中在40多年来对台湾政治总体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若干政治事件上。后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作为本书内容的10篇文稿。其中包括：孔立人案、刘自然事件、雷震案、彭明敏事件、台大哲学系事件、高雄事件、江南命案、中坜事件、十信案件、“五·二〇”事件等。这些事件兼有政治斗争和法律诉讼的特征，是观察台湾40年来政治发展历程所必须留意的部分政治焦点。它们彼此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结，有着政治发展的结构性脉络。其中每一事件都与当时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直接有关。从性质看：有些事件属于国民党内部斗争，有些事件属于党外斗争；有些事件具有反美色彩，有些事件则具有岛内发展与政治斗争互动的特点。研究这些事件，会有助于我们对台湾政治发展的总体了解。

最后需要说明：本书作者都是年轻学者，虽然他们曾经

注意收集和鉴别了大量材料，力求本着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来分析、研究问题，但限于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尚望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赐正！

目 录

序言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

- 研究中心主任.....赵宝煦 (1)
- 孙立人案.....张植荣 (1)
- 刘自然事件.....刘国奋 (30)
- 雷震案.....姚礼明 (49)
- 彭明敏事件.....陈福敏 (80)
- 台湾大学哲学系
- 事件.....潘银杰 (96)
- 中坜事件.....王绪圻 (122)
- 高雄事件.....范忠信 (144)
- 江南命案.....姜南扬 (165)
- 十信案件.....陈福敏 (191)
- “五·二〇”事件...宗 义 (206)

孙立人案

●张桂荣●

一 案件的背景与经过

50年代初，国民党逃台后，内外交困。为了挽救困局，蒋介石起用了亲美派的重要人物吴国桢和孙立人，一文一武，委以重任，以装点其政治门面，争取美国的援助。但是50年代中期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蒋介石对台湾的统治渐趋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蒋介石即有意培植儿子蒋经国为接班人。为了巩固蒋家天下，蒋家父子有意排斥异己，打击反对力量。跟吴国桢案一样，孙立人案是50年代国民党内部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加强极权统治的反映。

“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将军，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率领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因而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军界享有较高的国际威望。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孙立人是亲

美派的代表人物。因其背景特殊，蒋介石很器重他。国民党逃台后不久，1950年3月，即提升他为“陆军总司令”，1951年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后改任“总统府参军长”。每逢美军要人来访，蒋介石总要邀请孙立人陪座。孙立人故而出尽风头，成为军界头面人物之一。然而，1955年8月20日，“总统府”突然发布命令，称蒋介石已下令免去孙立人的“总统府参军长”之职。蒋介石的“总统命令”如下：

①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报候核办。此令。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成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此令。

②国防部副部长陆军二级上将黄镇球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陆军二级上将黄镇球为总统府参军长。此令。

孙立人被突然免职的消息传出，举世震惊。美国军方的反应尤为强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海军上将于8月20日当天约见蒋介石的驻美“大使”顾维钧，认为此案的发生，非常不幸，孙立人是“中国军方”最好的将领，希望蒋介石公平而满意地处理此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及国务卿杜勒

斯也驰电台湾，要求谨慎处理。国际新闻界亦为之哗然，纷纷要求台湾当局对此做出正式解释。8月20日，台湾“新闻局长”吴南如对外国通讯社记者正式发表了简要的谈话，就孙立人的免职与“郭廷亮匪谍案”的关系做了一个较为具体的新闻背景说明：

最近政府曾破获匪谍案，其为首分子郭廷亮为孙将军多年之部属。郭匪自三十六年随新一军调赴东北，即与共匪发生关系。迨东北沦陷后，该匪又接受匪方密令，利用其与孙将军之关系来台从事渗透与颠覆之工作。三十七年底，郭匪抵台，先在孙将军所主办之训练班供职，嗣调陆军总司令部服务，经潜伏一个时期后，于四十三年开始活动，凭其与孙将军接近之地位，一面资为掩护，一面勾结陆军总司令部督训组之江云锦等，形成组织，图作不法之行动。自去年八月共匪叫嚣攻台以来，郭匪等之渗透分化工作，更加积极，至今年五月间，乃竟企图制造事端，从事颠覆活动，经事先发觉，郭匪等均已依法就逮。关于匪谍部分，郭匪已直言不讳。至于全部案情正在审查之中。孙将军以郭匪廷亮等为其多年信任之干部，乃以旧属关系至被其利用，痛感疏于觉察，暗于知人，几至贻祸国家，因向总统辞职，并请查处，业经照准。另由总统命令组织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报候核办。

吴南如还透露，孙立人于1955年8月3日即向蒋介石具

呈引咎辞职，并自请查处。此后的许多新闻报道认为，孙立人早在6月初郭案发生后不久就自行提出辞职，蒋介石旋即派陈诚等“党政要员”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此案。孙立人8月3日致蒋介石的辞呈全文如下：

窃职才识庸愚，惟知忠义，自游学归国，预身宿卫以还，念八年间自排长以迄今职，纯出于钧座一手之栽培，恩深谊重，虽父母之于子女无以过之，对于钧座尽忠效力，不惜贡献其生命以及一切，冀报万一为此生之惟一之志愿。属当国家危难，奉命练兵。匪祸方深，求效心切。但问事功，未虑得失。于人才方面，急于搜罗，疏于甄选，竟至贤愚未辨，瑕瑜互收。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职随从垂卅年，尽忠效死，惟恐不及。乃竟发生郭廷亮及江云锦等案情，不但五内如焚，急悚万状，且愧对钧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曲，连日深刻反省职实有过错，应向钧座坦白自陈，请予悬处处者：

一、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以后，又选予任使，乃竟是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竟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亏职责。

二、两年前茅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督训练江云锦等

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运用彼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海无方，竟至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之嫌，且甚至企图演成不法之举动，推究源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

上述二事，均应接受钧座严厉制裁，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俱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哀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谨呈

总统

二 国民党对案件的调查与结论

蒋介石的“总统命令”与孙立人的辞职，引起了台湾岛内外的一场政治飓风。国民党朝野无不震惊，但对办理此案意见分歧。“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考虑到美国的反应，主张“不办此案”。“副总统”陈诚认为，此事已严重影响军中大气，必须加以处理。国际上以美国为代表，其军政各方交相驰电蒋介石要求对此案“慎重处理”。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是个“美国通”，认为美国朝野都对孙立人抱有好感，即向蒋介石建议了三点，以减少美方的疑虑：一是不要指控孙企图在军中发展个人派系；二是不要采用孙部下的供

词作为直接证据；三是怠忽职守是控孙的最严重罪名，但是必须让孙有机会在调查委员会前作证，答复问题。〔1〕

由于“郭廷亮案”的“案首”郭廷亮等人不具影响，而“涉嫌者”孙立人将军身为前“陆军总司令”和“总统府参军长”，又具有国际声望，所以各国关注的倒不是郭案的处置，而是国民党如何处理孙立人这位亲美名将。因此，国民党当局考虑到美国方面的反应，对孙立人案的处置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布置。首先是派重臣访美，疏导美方。1955年8月12日，蒋介石特别派遣“外交部长”沈昌焕借巡视馆务的名义访美，坐镇指挥对美国的疏导工作。沈抵美时，前来迎接他的台驻美“大使”顾维钧与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仍然蒙在鼓里。沈昌焕带来了一个“副总统办公室”的卷宗，里面装有案首的自首书、谈话记录，以及“国防部”的报告书。3人在美协商后决定建议在挑选案件调查委员会成员时，一定要注意公正性。顾维钧乃建议让王宠惠（法律权威）和何应钦（国民党元老）加入调查委员会。接下的两周里，沈昌焕穿梭来往于纽约与华盛顿之间，尽全力会晤所有关心孙立人的美方人士，减轻他们的不良反应。蒋廷黻负责与新闻界人士联络，使报界老板答应处理孙案新闻时，有所节制。由于台湾当局在美的疏导，美国官方对孙立人事件的抗议显得微弱无力，只要求蒋介石公平而慎重地处理其事。美国新闻界也只是做了节制性的报道与评论。《时代》周刊说：“五十五岁的孙立人将军，能干、勇敢，是最西方式的军事领袖”，他是因为与蒋介石有矛盾，才被赶下台的，“孙坚信，在现有领导下，台湾无法幸存，私下谈及大陆之失，纯

由于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

第二方面，蒋介石指示“参谋本部”、“国防部”、“监察院”、“国家安全局”、“军法局”、九人调查委员会等对孙立人案进行调查、审讯和总结。因此孙立人案的处置报告一共有6份。依序为：1.“参谋本部”调查报告。由时任“陆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高魁元、“总政治部”副主任蒋坚忍负责汇集，由彭孟辑主持，存于“参谋本部”，历任“参谋总长”未奉允许，不得私自阅览。2.“国防部”调查报告。由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马纪壮主持，其机密程度不及“参谋本部”调查报告，主要是供“监察院”五人小组参考，现存于“国防部”。3.“监察院”五人小组调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列为极机密文件。4.“立人专案”报告。系由“国家安全局长”郑介民召集各情治首长成立的“立人专案小组”所做的会议笔录。对于孙立人1947年10月来台练兵，与海内外的往来等均有详细记载。该文件藏于何处，外人不知。5.“军法局”审讯300多名军官的笔录。由时任“军法局长”的汪道渊汇集而成，存于“总统府”机要室，内容部分外泄。6.“九人小组调查报告”。是目前引用最广泛的关于孙案的资料。从这6份报告的调查成型背景来看，孙案并非寻常的政治案件。由于外界仅知“九人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更增加了人们对孙立人案的怀疑与好奇，这也给后世研究孙立人案增添了很大的困难。目前，研究者也只能就国民党最高层九人调查委员会及其报告书进行分析与研究。

九人调查委员会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于1955年8月20日成立的。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陈诚为主任委员。除陈

诚、何应钦是军人外，其余7人和孙立人没有恩怨纠葛。王云五、俞大维，非国民党员，似没有党派偏见；王宠惠是司法权威，一定会持公正立场。蒋介石似乎要制造出调查委员会的客观与公正形象。在9位调查委员中，何应钦因赴日治疗眼疾，一直请假。张群因“总统府”要务在身，“国防部长”俞大维因常赴“金马前线”巡视，也常告假。其他诸位委员是调查过程中的主力。九人委员会历时50天完成了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洋洋16 000多字。它由“引言”、“结论”等5个部分组成。其主体内容有：“郭廷亮所担负之匪谍任务及其所利用之因素”；“孙立人将军在军队所发动之联络组织”；“郭廷亮利用孙立人将军之关系进行匪谍活动之经过”。综合调查报告的方方面面，可以将其主要内容分如下几个方面概述出来。

关于调查的过程与目的：蒋介石的“总统命令”是要“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调查委员会遵照“总统”上述命令，规定“其工作范围应为彻查匪谍郭廷亮案有关孙立人将军部分之详情并具报。对于匪谍郭廷亮案所牵涉之活动，凡与孙将军有关者，系在本委员会调查及报告范围之内，本报告书所述，即为此项调查之结果，就范围而言，自不包括匪谍郭廷亮之全部”。由此看来，调查的目的不在于郭案本身，而主要在于追查孙立人将军“涉嫌”的罪过及其所犯错误的性质。

调查的过程根据报告的“引言”可分为如下几步：调查委员会首先提到蒋介石转来的“国防部”部长俞大维、“参谋总长”彭孟緝总集的关于郭廷亮等阴谋叛乱案的签呈与侦察报

告，并于8月26日举行第一次会议，至报告提出为止，此会共开9次。第二步为听取“国防部”、“参谋本部”关于本案的报告及有关的全部案情文件。调查委员会随时函请“国防部”提出书面说明，帮助委员会了解分析郭廷亮等的自白书及“国防部”的审讯笔录。第三步为分组调查郭案“案首”。由王云五直接调查郭廷亮、王善从、田祥鸿，于9月10至11日在“国防部”军法局分别进行。由黄少谷直接调查江云锦、陈良垠、刘凯英，时间、地点与上相同。在这两组的调查中，“案犯”对其原有的自白书、审讯笔录及郭廷亮日记等供认不讳，分别签名按手印，并录音。第四步为直接询问孙立人将军。由主任委员陈诚带领在台全体调查委员于9月19日直接询问孙立人将军。这天上午9时至下午3时半，孙立人在阳明山第一宾馆阅览了陈诚送来的全部调查笔录。下午4时，陈诚及全体在台委员询问孙立人本人。这些调查材料都在8月3日孙立人向蒋介石提出辞呈时阅过，因此孙立人很快就调查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复。当场录音与笔录，由孙立人校阅签名后认可。调查委员会在以上调查基础上，于1955年10月8日提出了国民党最高层的《九人调查委员会报告书》。

关于“郭廷亮匪谍案”与“屏东兵变”：根据报告书可知，主犯郭廷亮，云南人。1939年考入孙立人任团长的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这是孙立人与郭廷亮建部属关系之始。1941年，税警总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仍由孙立人率领，郭为该师中尉排长，随师远征印缅。1946年该师改编为新一军，郭升为少校连长。新一军于1948年1月驻扎沈阳。郭与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常

“以匪党言论煽惑并争取郭”。沈阳失陷后，郭请求白设法离开“匪区”。白介绍其兄白经文与郭会面。白经文时任“东北铁路护路军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他嘱郭赴台湾时为中共工作，以期“长期潜伏，掌握部队，制造国军大规模之变乱”，为“匪军攻台时实行内应”。郭廷亮随新一军败退台湾后，先后在孙立人手下任少校营长、陆军军官学校教导营营长。在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期间，郭一直在孙部下面工作，直到1954年孙立人调任“总统府参军长”为止。郭为孙将军部下，长达16年之久，深得孙的信任。

1954年9月某晚7时许，有一操北方口音的李某访问郭家，对郭说：“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待的任务。他利用其与孙将军多年的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了100多位校尉级军官，准备在适当时候发动“兵变”。

从犯共有6人。江云锦，37岁，中校，为孙立人主持的陆军第四军官训练班军官。田祥鸿、刘凯英为第四军官训练班毕业生。这3人为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同学联络人。孙立人要求他们“运用彼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从“侧面联络”。由于江云锦工作不积极，1954年8月起，孙将军指定郭廷亮主持此项联络工作。根据郭廷亮和田祥鸿的供词，孙将军要求他加强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的联络，是为了“建立好领导部队的力量，硬性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郭廷亮自称，他利用了孙立人联络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的机会，“为匪作兵运的任务”。9月8日，郭在军法局受审时称“他有他的意图，（孙）就是要利用我联络部队学生，造成一股势